

A Study of G.C.Spivak's Thoughts
Tra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olonized Subjectivity

斯皮瓦克思想研究

追踪被殖民者的主体建构

陈庆·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斯皮瓦克思想研究

追踪被殖民者的主体建构

A Study of G.C.Spivak's Thoughts

Tra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olonized Subjectivity

陈 庆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上海·西安·北京·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斯皮瓦克思想研究:追踪被殖民者的主体建构 / 陈庆著.

—上海: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5

ISBN 978-7-5100-9220-6

I. ①斯… II. ①陈… III. ①斯皮瓦克, G.C.—思想评论

IV. ①B712.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25411 号

斯皮瓦克思想研究 追踪被殖民者的主体建构

著 者 陈 庆

出版人 陆 琦
策划人 姜海涛
责任编辑 姜海涛
装帧设计 车皓楠
责任校对 石佳达

出版发行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地 址 上海市广中路 88 号
电 话 021-36357930
邮政编码 200083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市印刷七厂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3
字 数 220 000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5100-9220-6/B·7
定 价 40.00 元

www.wpcsh.com.cn

www.wpcsh.com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59110729

目 录

绪论	1
第一节 斯皮瓦克的学术历程	2
第二节 国外斯皮瓦克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11
第三节 国内对斯皮瓦克论著的翻译与研究	23
第四节 本书的研究范围及研究架构	37
第一章 在女性“他者”中的异质性	39
第一节 《在他者的世界里》与女性主义思考	40
第二节 性别问题中的异质性	45
第三节 生产与生育中的女性主体异质性	50
第四节 经典小说中的女性主体异质性	57
第二章 翻译中的性别主体性	65
第一节 《翻译的政治》中的伦理特性:爱欲还是屈服	66
第二节 翻译中正确的他者	71
第三节 女性主义译者的翻译观:特定语言中的伦理特性	78
第四节 女性主义译者的任务:代理他者的语言机制	84
第三章 追踪“土著发声者”	91
第一节 被提前取消的“土著发声者”	93
第二节 康德哲学中有关被殖民者主体性的规划	101
第三节 黑格尔与《博伽梵歌》之间的结构性共谋	106
第四节 马克思哲学建构的被殖民者主体性	114

第四章 意识形态机制中的主体表述	122
第一节 意识形态机制中的认知暴力	125
第二节 重读历史档案的史学立场及其方法	133
第三节 “世界化”的认知暴力:殖民地的他者化生产	138
第四节 被悄然引入的大写主体:反思福柯与德勒兹	145
第五节 女性主体建构中的操弄:档案中被禁言的舍摩国王妃	152
第五章 人权话语政治中的主体性建构	160
第一节 问题:将人权侵犯合理化	162
第二节 基于教育的人权主体性生产	168
第三节 人权理论中的乞题谬误	172
第四节 新型的人权教育方式	178
第六章 斯皮瓦克主体性思考的当代意义	188
参考文献	193
后记	202

绪论

佳亚特里·查克勒维蒂·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是现任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也是西方学界与政治活动中颇具影响力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活动家。她在当代西方学术理论界广有影响,其理论也富有争议。斯皮瓦克与萨义德、霍米·巴巴齐名,他们被美国学者罗伯特·杨誉为后殖民理论领域的“神圣三位一体”^①,国内外众多学者也都引用了这一评议。除了在后殖民领域享有广泛的国际声誉,斯皮瓦克在女性主义理论、国际翻译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等领域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近四十年的学术生涯中,斯皮瓦克的研究范围遍及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翻译政治理论、解构主义理论、文化研究、历史档案学、政治哲学等领域,她探讨了当代后殖民研究中的许多重要议题,如底层人的历史研究、翻译中的殖民话语、第三世界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化角色与政治参与,还有种族、阶级与性别的关系等。无论她思考的问题如何复杂,涉及的内容如何广泛,始终贯穿其中的是这样一条线索:反思西方知识体系如何生产出被殖民者的主体性。她用解构主义的方法重新检验建构主体性的哲学原则以及由此强制性地塑造出来的被殖民者的自我认同,并对影响主体建构的各种因素进行历史追踪与文化反思。她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可看作一项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中有关主体性构成如何被殖民化的研究。这其中的主体性指什么?它有怎样的复杂成因?它如何规划出底层人有关自我的认知?生产这些认知的知识体系中存在着怎样的认知暴力?这些都是斯皮瓦克思考的重要问题。围绕西方人文知识中的某些重要前提,斯皮瓦克审视了当代知识界有关主体

^① Robert Young, *Colonial Desire: Hybridity in Theory Culture and Race*, London: Routledge, 1995, p.7.

假设与他者想象的支柱。她拆解产生它的话语体系,挑战知识霸权;同时,她的论述也呈现了全球化时代思想界的复杂性:这是一幅欧洲人与亚洲人、知识精英与底层人、翻译者与被翻译者、人道主义援助者与被援助的土著人之间压迫与合作、抵制与融合、反抗与共谋的复杂景象。

第一节 斯皮瓦克的学术历程

斯皮瓦克具有多重身份,这一特点历来备受研究者的关注。她是女性,来自第三世界国家,是第一世界国家中的学者,同时还是人权倡导者,是第三世界妇女运动的倡导人,也是投身于底层的教育家。从斯皮瓦克的这些侧面,人们可以读到某种萨义德所说的“身份的冲突”^①,但她多次强调,要对自己身上的任何一重身份都保持警醒和距离。

早在1987年,斯皮瓦克就提到:公民身份是一个抽象概念,承认这个概念,哪怕是为了破除陈规,它也仍然隐含着某种进入政府体系的政治选择。无论人们说她是印度人或美国人,都会令她感到对方像是在提及陌生人。^②对身份概念的持续批判贯穿了她的整个学术生涯。2003年,在与印度纪录片导演 Swapan Chakravorty 的对话中,斯皮瓦克仍然表示,她不会在自己身上打上任何一种标签,因为在她看来,这些概括性的术语都意味着束缚,当人们谈及这个人是什么身份时,其实是在谈论这个人隶属(belong)哪个群体。斯皮瓦克这样说道:“我并不那么外国(foreign),可我也不够本土(native)……我用我自己的方式找到许多个家乡,对我来说,宁可做无根漂泊(root in air)之人,也不愿做世界化(cosmopolitan)的一员。”^③同年6月,在与斯科普里(马其顿)女性主义学者 Suzana Milevska 的访谈中,她提到,应当警惕身份认同中的政治问题以及由此而来的本质主义危险。2004年,斯皮瓦克在接受中国学者严海荣博士的专访时明确表示:所谓的“亚洲人”身份是一种虚构,因为亚洲这一概念来自欧洲中心知识体系的改造和编撰。^④对斯皮瓦

① 萨义德:《乡关何处》,彭怀栋译,台北:台湾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第187页。

② G.C. Spivak, *The Post-Colonial Critic*, Now York: Routledge, 1990, p.75.

③ Swapan Chakravorty, Suzana Milevska, Tani E. Barlow (ed.), *Conversations with Gayatri Chakaravorty Spivak*, London: Calcutta, 2006, p.54.

④ Swapan Chakravorty, Suzana Milevska, Tani E. Barlow (ed.), *Conversations with Gayatri Chakaravorty Spivak*, London: Calcutta, 2006.

克来说,身份是一个更具有权力意味的词汇,它所隐含的政治话语内涵,令个体受制于固定模式的自我想象。同时,身份又是一种存在模式,一旦认领某一层身份,则必须调动个体的认知来适用于对其知识的理解。斯皮瓦克并非否认自己是拿美国绿卡的印度女学者,她强调的是对相关知识体系保持怀疑,而这些知识体系包括我们如何认知“亚洲人”,如何认知“印度人”,如何认知“女学者”等。正如她在2012年出版的文集《全球主义时代的美学教育》导言中所写的:“在全球化外在特征中,我们需解析出的文化困境是表现性的双重(身份)束缚,而非代表性的双重(身份)束缚,后者一再掩盖现代资本所拒绝承认的事实,即它们对身份的危險操控。”^①在笔者看来,这符合她思想中一贯关于认知暴力的批判,与她对“不合法”知识的探索也一脉相承。

要理解斯皮瓦克的学术立场,我们需要回溯她早期的生活与学术经历。

1942年2月24日,斯皮瓦克出生在印度西孟加拉邦首府加尔各答。在她出生这年,印度爆发了现代史上有名的“孟加拉大饥荒”(Bengal Famine)。起因是英军在新加坡战役遭到日军的重创,由此而丧失了对战时英联邦国家最大的粮食供应地——缅甸的控制权。为了确保战时供应,英国不顾殖民地状况而在印度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据统计,当时死于挨饿和营养不良的人数高达三百万。^②斯皮瓦克谈到她在饥荒的阴影中长大,童年的最早记忆便是关于饥荒和民间团体的抗争。^③她谈到“印度人民戏剧协会”(the Indian People's Theatre Association, IPTA^④),在接受访谈时,斯皮瓦克盛赞IPTA的抵抗精神,她认为:他们利用了敌人认可的形式——殖民者误以为戏剧表演无可非议,是艺术“自主”领域;而IPTA则将表演变为利器,将政治与美学结合起来。斯皮瓦克谈到,她与她的同龄人是这样一代人:“(我们是)第一代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都在印度独立时期度过的人,是加尔各答第一代极为理想主义的左派。”^⑤他们的童年与青少年,恰好处在20世纪50年代被殖民国家

① G.C. Spivak, *An Aesthetic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reface, p. x.

② 林承节:《印度近现代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639页。

③ G.C. Spivak, *The Spivak Reader*, Donna Landry and Gerald Maclean (e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p. 16 - 17.

④ IPTA协会成立于1942年,由非职业演员组成,其宗旨是以民族文化唤醒印度民众,他们以戏剧表演为反抗的媒介,表达出对英殖民统治造成饥荒的愤怒,还有组织民族抵抗运动的决心,该协会的戏剧实践可说是斯皮瓦克受到的最早的反殖民教育。

⑤ 刘健芝、许兆麟选编:《庶民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237页。

解殖化浪潮的高潮期(on the cusp of decolonization),国家政治独立、经济发展、人民民主诉求,这些重大历史事件铭刻在他们童年及青少年时代的生活中。

斯皮瓦克后来提到,当时印度国民大会中已能见到解放了的资产阶级妇女,她们参与了民族斗争。政府提出“妇女没有自由,印度就不能兴起”等口号,这令斯皮瓦克开始意识到女性主义政治的重要性。但女性主义政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形成”,却有赖于斯皮瓦克的家庭教育,尤其是母亲的教育。^①在接受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 Howard Winant 的采访时,斯皮瓦克这样描述自己的生长环境:“我出生在一个进步的资产阶级家庭,生活朴素,强烈赞同原型女性主义者(proto-feminist)。我的父母给了我一种普世主义式的童年生活:没有种姓等级制度,感情上是反英国的,‘富人是坏的,所有宗教都是平等的;不像我们这个阶层的其他任何人,我们要以同样的方式来抚养女孩和男孩’……我在温暖的家庭怀抱中就已开始接受早期的女性主义教育——这是我能得到的最好的东西。”^②

斯皮瓦克的父母为她选择的学校是孟加拉本地的初级女子学校,这所学校全名为“St. John's Diocesan Girl's Higher Secondary School”,它并不是上流阶层女孩就学的修女会学校(Convent),而是普通的教会学校。但这所学校的教学方法让斯皮瓦克记忆犹新。斯皮瓦克提到,该校的办学理念具有两重观念,它介于印度民主独立理想与旧有的英国殖民教育体系之间。^③在这所学校里,她必须学会使用孟加拉语和英语,前者是斯皮瓦克的母语,后者是她日后进行研究使用的语言,往返于两种语言,这是她最初的翻译体验。她意识到,用哪种语言来获取哪部分知识,两种知识之间如何互相沟通,这在翻译理论中并没有简单答案。有关翻译中的政治思考,这几乎是整个第三世界知识分子都共同面临的问题,因为它不可避免地与身份建构联系在一起。研究者处理语言的不对等不仅是思考文化差异,更多的是关注话语权力的交叉与博弈。斯皮瓦克对翻译的思考来源于此,她写道:

我把我自己视为说双语的人,对这样的人来说,我确实要翻译

① 刘健芝、许兆麟选编:《庶民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237页。

② G.C. Spivak, *The Spivak Reader*, Donna Landry and Gerald Maclean(e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18.

③ G.C. Spivak, *The Post-Colonial Critic*, Now York: Routledge, 1990, p.35.

自己的母语……我有两张脸,我不是被放逐者,也不是移民者,我是在美国持绿卡的新殖民主义批评家。在这个位置上,我很难向谁妥协,因为我并非在美国自我边缘化,以博取那些真正边缘化的人们的同情……如今我反观自身,明白自己是能在两个语境中行动的人,并警醒自己保持批判的声音,不让其中一个吞并另一个。^①

西方语言对东方语言的渗透和规训、东方语言对西方语言的抵制和内化、翻译的政治问题以双语的形式呈现,这些现象交叉出现在斯皮瓦克学生时代的日常生活中。她体会到两种不同知识体系,还有话语权力的争夺与纠缠以及身份政治的复杂性。除此之外,我们从以上引文还可以看到,斯皮瓦克强调要与不同语言中隐含的政治权力保持距离。因为,不同语境得以成立的原则乃是存在于个体的身份认同中,而要认识这些身份认同所带来的局限,就需要抽离该种语境的视角。这种视角不屈从于主流判断,也不盲目遵守边缘抵抗的立场;因为来自边缘化地带的抵抗逻辑,往往有可能复制主流权力话语的运作规则。斯皮瓦克的双语经验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连续性翻译,我们应该将之理解为自觉的批判性思考。在这个过程中,斯皮瓦克形成了自己的翻译思想,这也激发了她后来从事翻译实践。

斯皮瓦克在其本科与研究生阶段进一步深化地学习和研究了语言。1955年,她考入加尔各答大学的统辖学院(Presidency College),就读英语文学专业。1959年,斯皮瓦克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获英国文学和孟加拉文学金奖。多年以后,斯皮瓦克回忆这段大学生活时仍充满感情。她说,一提及统辖学院,她就陷入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怀想当中。^②学院虽然沿袭殖民时期的英式教育政策,但学校学术氛围活跃,各种激进思想登堂入室。由于学生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因此斯皮瓦克很早便触及到印度社会的一些尖锐问题,如阶层隔离、底层人歧视等。她开始萌发对社会责任、政治改良、种族、宗教等问题的思考。在这所学校里,她得遇良师,在日后的访谈中,斯皮瓦克数次提到文学教授塔拉克-巴布(Tarak-Babu),他教会斯皮瓦克怎样阅读:一方

^① G.C. Spvak, *The Spivak Reader*, Donna Landry and Gerald Maclean(e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18.

^② Swapan Chakravorty, Suzana Milevska, Tani E. Barlow (ed.), *Conversations with Gayatri Chakaravorty Spivak*, London: Calcutta, 2006, p.4.

面要忠于原文,一方面要敢于想象。这一教诲令她受益终生。^①

1961年,斯皮瓦克进入美国纽约康奈尔大学文学系,一年后获得硕士学位,随后又转入比较文学系攻读博士。其间,她师从好几位著名学者,包括耶鲁“四人组”之一的保罗·德芒教授(Paul de Man, 1919—1983)。她也在这个时期开始学习德语和法语,这为她后来翻译德里达的法文原著打下了良好的语言基础。^② 1967年,她在德芒教授的指导下完成博士研究,题为《巨轮:叶芝诗歌中抒情之声的几个发展阶段》(*The Great Wheel: Sta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Yeats' Lyric Speaker*),她也因此获得康奈尔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对斯皮瓦克来说,在康奈尔大学求学的六年,是她人生中“文化震撼”和“茫然”的时期,^③ 因为她在家乡与白人没有任何接触,而到了美国,她却需要面临真正意义上的东西文化差异。她这样描述道:“我是在经历自己的阶级震撼、文化震撼,而且没有多少自我意识。回顾过去,我意识到,至少有五年或六年的时间,我就像一个‘母语是英语’的人,我努力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像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式的印度人,这与我在加尔各答的生活没有一点关系。”^④

1965年,斯皮瓦克前往爱荷华大学担任助教。一年后,一个偶然机会,她订购了德里达《论文字学》法文版。读完这本书后,她深感这是一本划时代的著作。在此之前,斯皮瓦克并未听说德里达其名,也不知道就在这一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举行的结构主义学说大会上,德里达与拉康等法国思想家掀起了一场理论革命。^⑤ 其后,斯皮瓦克将这本书翻译成英文,并撰写了她那篇影响深远的译者序言。翻译该书的实践,在斯皮瓦克的学术生涯上是一个转折点。在1989年的一次访谈中,她说,她当时从一个现代主义者从此一脚踏入解构主义的地盘。^⑥ 经过将近十一年的反复修改,《论文字学》英译本终于

① Swapan Chakravorty, Suzana Milevska, Tani E. Barlow (ed.), *Conversations with Gayatri Chakaravorty Spivak*, London: Calcutta, 2006, p.4.

② 斯皮瓦克在攻读博士期间学习德语和法语的事见1992年她与Leon De Kock的访谈,见Ariel, “New Nation Writers Conference in South Africa”, *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nglish Literature*, Vol.23, No.3, 1992.

③ 同①。

④ 刘健芝、许兆麟选编:《庶民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238页。

⑤ 徐岱:《解构主义与后形而上诗学》,《文学评论》2006年第5期。

⑥ Mark Sanders,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Live Theory*, London: Continuum, 2006, p.5.

于1976年付梓出版,此时的斯皮瓦克已经担任爱荷华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及系主任(1975—1978)。

斯皮瓦克不仅是一位学者、翻译家,同时还是一位教育家。1978年以来,她在多所大学任教,教授的课程包括马克思理论、解构主义、比较文学、底层人历史等。她在数所大学担任过教职,其中有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1978—1984)、艾莫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 1984—1986)、匹兹堡大学(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1986—1991)。1991年后,她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任教至今。与此同时,斯皮瓦克还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一些研究机构任职,^①她也是一些新锐学术刊物的编委和学术顾问,这些刊物包括《文化批评》(*Culture Critique*)、《疆界2》(*Boundary 2*)、《新型构》(*New Formations*)和《离散》(*Diaspora*)。她也是国际写作与翻译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Writing and Translation)的顾问委员会编委。斯皮瓦克也积极参与了面向印度土著部落的师资培训项目,她还加入非政府组织(NGO)参与组织考察孟加拉地区的生态农业发展状况。她也应邀到美洲、欧洲、亚洲、非洲的多个高等学府讲学。值得一提的是,斯皮瓦克数次到访中国:2001年她应邀到香港科技大学开设比较文学的短期课程;2002年,她前往云南西双版纳山区,举行了基层教师培训工作,这也是她在印度所做过的事情;2006年,她分别在清华大学和北京语言大学做过两场精彩演讲。

在斯皮瓦克三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她跨越了广阔的领域,她的行文也因为晦涩艰深而引起争论。她所关注的问题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思想界和后殖民思潮中的许多重要议题有关:她对欧洲近代哲学传统进行了具有解构意义的政治阅读(a deconstructive politics of reading),她关注西方知识体系如何生产被殖民主体。她考察了这样的问题:在帝国主义霸权话语与本国男权思维的双重压迫下,底层妇女的声音如何被曲解,或者被虚构和被代

^① 根据四川大学关榕珍的博士论文《斯皮瓦克研究》,这些机构包括:美国国家人文研究所(National Humanities Institute)、卫斯理人文研究中心(Center of the Humanities at Wesleyan)、澳大利亚国家大学人文研究中心(Humanities Research Center at the Australia National University)、印度的加尔各答社会科学研究中心(Center of the study of Social Sciences in Calcutta)。她也是一些基金会的专家,如贝拉吉奥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 in Bellagio)、肯特基金会(a Kent fellow)以及古根翰基金会(a Guggenheim Fellow),还有印度巴络达萨亚基王公大学泰戈尔基金会(Tagore Fellowship at the Maharaja Sayajirao University of Baroda in India)等。此外,还有底层人研究小组(Subaltern Studies Collective)等。

表。她反对一切话语霸权,无论这种霸权是显现在翻译领域、历史档案书写领域还是人权领域。斯皮瓦克从未对自己的学术生涯进行过总结,但她跨学术研究的视野则处处显现于其著作中。

在《后殖民理性批判:迈向当下正在消逝的历史》(1999)一书中,斯皮瓦克将她从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的若干旧作(如《底层人能说话吗?》《舍摩国的王妃》《三个女性的文本与帝国主义批判》等)纳入书中,其内容包括文学作品研究、后殖民历史话语研究、对第一世界的女性主义理论的批判等。她以哲学、文学、历史和文化为题,将自己的论述分为四章。从这些标题可见,斯皮瓦克并不同意给自己贴上解构主义理论家的标签,也并不认为底层人研究是她思考的基本内容。在《全球主义时代的美学教育》(2012)一书中,斯皮瓦克将时间跨度长达二十三年的不同时期的论文收入该书,并在前言部分对自己在学术生涯中一直思考的问题这样概括:“作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我感到我在此运用我的想象力,不仅是为了想象跨国散居人士(diaspora)、流亡者、求庇护者所遭遇的困境,而且是为了否认他们身上那种清楚无误、宛若命定的解决方案,它通常呈现为由美国赐予世界避难所。有鉴于此,我总是不得不直面如何对超出我所属群体之外的人们‘诉说’的问题。”^①

在本书中,笔者尝试将斯皮瓦克的思想发展分为三个时期,这主要是出于研究便利的考虑,而非意味着斯皮瓦克本人的思想演变能够截然区分出来,笔者划分的三个时期在年代衔接上也会有所重叠。

第一个时期是斯皮瓦克研究德里达理论的时期(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在这一时期,斯皮瓦克的思考主要围绕译介德里达的《论文字学》展开。她重点探讨了解构主义的哲学观,并诠释了解构主义的方法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是她为《论文字学》所写的译者前言。这篇前言长达八十页,其中,斯皮瓦克将德里达的理论置入现代哲学体系,这是自尼采、海德格尔、胡塞尔以来有关“在场质疑”的精神传统。从“涂抹”(under erasure)^②的

^① G.C. Spivak, *An Aesthetic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reface, p.xiv.

^② 这个词在德里达《论文字学》中的法语原文是“sous rature”,斯皮瓦克将之翻译为“under erasure”,即在涂抹的痕迹之下被涂抹的部分仍然存在之意。斯皮瓦克在“译者前言”中对此这样解释:“涂抹意为把一个词写下来又划掉,然后把词和删除线都打印出来(因为该词不够准确,所以把它划掉;因为该词是必要的,所以仍要把它写出来)。”见斯皮瓦克:《德里达〈论文字学〉译者前言》//陈永国、赖立里、郭英剑主编:《从解构到全球化批判:斯皮瓦克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7页。

角度,她深入阐述了德里达提出的“延异”概念。这一时期她发表的文章也深受德里达解构主义理论的影响,如《国际主义框架下的法国女性主义》(1981)、《革命仍没有模式:论德里达的“有限公司”》(1980)。

第二个时期是斯皮瓦克后殖民理论的形成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90年代末),她的许多产生深远影响的著述均写于这个阶段。从这一时期开始,斯皮瓦克加入底层人研究小组(Subaltern Studies Group),成为该学派重要的理论家之一。底层人研究学派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的南亚史教授古哈(Ranjit Guha)与一批留学英国的年轻历史学家一起提出了重读南亚殖民史的口号。古哈认为,印度民族史学研究长期被精英主义主宰,这个民族未能成就自己的历史研究,因此重新发掘档案中底层人民的声音显得尤为必要。这一学派的主要刊物为《底层人研究:关于南亚历史与社会的书写》。1988年,斯皮瓦克与古哈共同编辑出版了《底层人研究选读》(*Selected Subaltern Studies*)一书,并邀请萨义德作序。但斯皮瓦克并不认同底层人研究小组的一些基本观念,她批评古哈等人研究中的本质主义,认为他们将底层人“理解为同一性,而不是差异性”^①。她发表的《底层人研究:解构历史编纂学》(1985)、《舍摩国的王妃》(1985)、《底层人在文学中的再现》(1987)、《底层人能说话吗?》(1988)等文章,填补了底层人研究学派中对妇女研究的空白。

与此同时,斯皮瓦克也开始关注女性主义理论与第三世界妇女状况之间的关系,发表了《女性主义与批评理论》(1985)、《三个女性的文本与帝国主义批判》(1985)、《帝国主义与性别差异》(1986)等相关文章,批评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局限。她指出,将第三世界妇女视为他者,将她们的独特经验置入西方话语体系内解读,这种做法抹杀了其中的异质性特征。

1987年,她翻译了孟加拉作者马哈斯维塔·德维的小说《送乳者》(*Breast-Giver*),这篇小说的译文后来收录进《在他者的世界里:文化政治文集》(1987)一书。1995年,斯皮瓦克将德维的小说集《想象的地图》(*Imaginary Maps*)翻译成英文。从这一翻译实践出发,她撰写了《马哈斯维塔〈想象的地图〉:译者序跋》一文,反思了翻译理论中的政治问题。

^① G.C. Spivak,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Cary Nelson, Lawrence Grossberg (ed.),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Champaign-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 pp.271 - 313.

第三个时期是斯皮瓦克研究多元文化的时期(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斯皮瓦克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分析了全球资本时代的一些问题,即在平等、发展的口号掩盖下存在的跨国界剥削和压迫等。她写了《我们的亚洲——如何成为一个大陆主义者》(2001)、《纠正错误——走进原住民的民主》(2002)等文章。她还与朱迪·巴特勒一起出版了对话录《谁在歌颂民族国家?》(*Who sings the nation-state?* 2007)。书中,两人发表了在“9·11事件”后她们各自对语言、政治、新移民族群的身份归属等问题的看法。

这一时期,斯皮瓦克做了大量的翻译工作。她将第三世界的文学作品引入到英语世界。她完成的译著有马哈斯维塔·德维(Mahasweta Devi)的小说集《老妇人》(*Old Woman*, 1997)、《乳房的故事》(*The Breast Stories*, 1997)和《克缙·穆达和他的箭》(*Chotti Munda and His Arrow*, 2000)。她还翻译了18世纪孟加拉诗人雷·普楼斯法德(Ram Proshad)的诗集《卡利之歌:一个循环》(*Song of Kali: A Cycle*, 2000)。

斯皮瓦克更重要的收获是四部文集,分别是《后殖民理性批判:迈向当下正在消逝的历史》(*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 1999)、《一门学科之死》(*Death of a Discipline*, 2003)、《他者的亚洲》(*Other Asias*, 2006)以及《全球主义时代的美学教育》(*An Aesthetic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2012)。《后殖民理性批判》是斯皮瓦克对自己从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初后殖民理论研究的总结。《一门学科之死》收集了斯皮瓦克反思比较文学学科状况的论文。《他者的亚洲》收录了斯皮瓦克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思考人权、全球化时代反思身份政治等问题的文章。《全球主义时代的美学教育》选入了斯皮瓦克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21世纪初这二十三年间的二十五篇论文。斯皮瓦克在导读中提到:“这是一本关于生产性地解开另一个欧洲文明传奇——美学枷锁的书。”^①虽然文集命名为美学问题,但确切而言,选入书中的篇章并非探讨抽象的美学概念,而是讨论西方理论中的抽象话语如何影响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政治实践。有不少文章属首次编入斯皮瓦克文集,如以“纯文学”术语解析斯图亚

^① G.C. Spivak, *An Aesthetic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introduction, p.1.

特·霍尔(Stuart Hall)的文化理论、反思比较主义、思考美国黑人区(Harlem)的文章等。

总体而言,斯皮瓦克研究的问题颇为丰富,涉猎甚广,且论题跨越了多种学科。她的论文显示出丰厚的学养,在同一篇文章,她从容自如地出入于不同的理论体系,她也能将海德格爾的存在主义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信手拈来。她承认从福柯、德里达等解构主义大师那里获益匪浅,但她并不避讳对他们思想局限的批判。她从未自诩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却多次撰文分析马克思理论,并认为其政治经济学理论比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更适用于底层人研究。她的著作中既批判了从康德、黑格尔到马克思这一西方现代哲学体系中包罗万象的大世界框架,却也并不赞同福柯与德勒兹等法国哲学家提倡的微观权力分析法。她在多个访谈中坦言自己是女权主义者,而她对女权主义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批判西方精英女权主义理论。由此,她对底层妇女研究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第二节 国外斯皮瓦克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一、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斯皮瓦克研究概述

自斯皮瓦克翻译的《论文字学》付梓以来,她的研究在欧美知识界便引起了关注。正如《斯皮瓦克读本》的编者所说,斯皮瓦克思想的复杂性注定了她无法被简单划入任何一个学科,而其行文的艰深晦涩又令研究者徒生感慨。^①就目前笔者收集到的文献资料来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研究者侧重于理解斯皮瓦克著作的主要内容,他们也探讨斯皮瓦克思想中出现的跨学科、跨知识领域的学术特点。早期学者对斯皮瓦克思想的关注与当时学界风起的后殖民思潮有关,人们更多地停留在评论或分析其后殖民视角和解构主义方法上,对于斯皮瓦克思想作为整体的丰富性缺少研究,也没有考虑斯皮瓦克与其他理论家的影响关系,或展开横向比较。

最早的斯皮瓦克研究者是那些为她的文集写序以及编辑其文集的学者。1987年,匹兹堡大学的教授科林·麦凯波(Colin MacCabe)应邀为斯皮瓦克

^① Donna Landry and Gerald Maclean (ed.), *The Spivak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 107.

的第一本论文集《在他者的世界里：文化政治论集》(*In Other Worlds: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撰写前言。在这篇前言中，麦凯波称斯皮瓦克为“一个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者”，这是对斯皮瓦克思想特征的最早概括，后来被研究者广为引用。

20世纪90年代以后，英美学界不少研究者将斯皮瓦克的思想分为五个主题来进行讨论，分别是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和翻译理论。最早这么做的学者是两位美国文学评论家格林伯特(Stephen Greenblatt)和冈恩(Giles Gunn)，他们在1992年合编了《重画界线——英美文学研究转向》(*Redrawing the Boundari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一书。^① 这本文集以呈现英美文学批评中的后现代转向为主要目的，而斯皮瓦克被视为具有影响力的文学批评家之一。编者认为，从上述五个主题入手有利于理解斯皮瓦克的跨学科特点。虽然格林伯特和冈恩对斯皮瓦克思想的评论比较简短，但他们所采用的这种分类法影响了不少后来的研究者。

这一时期，随着后殖民理论的发展，斯皮瓦克的论文《底层人能说话吗？》《舍摩国的王妃》等引起热议。研究者通常将斯皮瓦克归于后殖民理论家，并对她在这方面的学术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者是加拿大温尼伯大学的历史教授罗伯特·杨(Robert Young)。杨运用后现代理论反思西方史学建构，作为历史学家，他高度肯定了斯皮瓦克对南亚殖民史研究的开拓。1990年，在其史论专著《白色神话：书写历史与西方》(*White Mythologies: Writing History and the West*)一书中，杨写道，长期以来，西方人所构建的世界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白人的神话，其中包含大量对非西方民族的偏见和误解。他认为，西方人在构建世界历史时，将一个所谓的“第三世界”人为地割裂出来，作为西方话语的残余物。在此基础上，杨将斯皮瓦克视为解构西方思想传统与“去殖民化”的理论大家，从而充分肯定了她在方法论上的突破。^② 他称斯皮瓦克“不拘于单一的立场”，“没有因为立场问题而拒绝任何一种西方理论”，“对与后殖民语境错位的西方理论不生

^① Stephen Greenblatt, Giles Gunn, *Redrawing the Boundari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Modern Language Assoc of America, 1992.

^② Robert Young, *White Mythologies: Writing History and the West*, London: Routledge, 2004, pp.157 - 213.